



东亚人文100丛书

东亚出版人会议 编选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

[日]鹤见俊辅著 邱振瑞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013044668

C955.313

38

东亚人文100丛书

东亚出版人会议 编选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C955.313



北航

C1652367

38

2013.08.10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进字 28 - 2011 - 144 号（原版）
图进字 28 - 2011 - 143 号（译文版）

SENJIKI NIHON NO SEISHINSHI

by Shunsuke Tsurumi

© 1982, 2001 by Shunsuke Tsurumi

First published 1982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3

by Sichu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Chengdu, Sichuan, China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Copyright © 2010 行人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译稿版权由台湾行人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 (日) 鹤见俊辅著；邱振瑞译。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 4

(东亚人文 100 丛书)

ISBN 978 - 7 - 5408 - 6168 - 1

I. ①战… II. ①鹤… ②邱… III. 思想史 - 研究 - 日本 - 1931 - 1945

IV. ①B313.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5684 号

责任编辑 何 杨 李 涛
特约编辑 马健全/一石文化
装帧设计 陆智昌/一石文化
责任印制 姜 卫 杨 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 编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制 作 成都勤慧彩色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规格 146mm × 208mm
印 张 7.5 插页 2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59

营销电话: (028) 86259477 邮购电话: (028) 86259694

编辑部电话: (028) 86259381



东亚人文100丛书

《东亚人文 100 丛书》总序

安庆国

长期以来,由于地理、民族及历史等诸方面的原因,逐渐形成了如今以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为主的东亚文化圈。在这里,东亚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从地区文化的角度来看,东亚可以说是相对完整的一体,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各国各地区逐渐生发出相似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全球化的推进,特别是进入近现代后,因各地历史进程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又都发展出自身特点鲜明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模式,最终形成今天东亚地区纷繁复杂的局势。

从流传下来的各种文献及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东亚

地区的思想文化交流频密,各国在儒学、汉字、佛教思想等的影响下构建出同根同源却又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而东亚地区的文明也跨越了地域的范围,以其深厚的积淀、悠久的传统和超然的精神气质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文明的日益繁荣,东亚文明受到极大冲击。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在西方现代文化影响下,在很长一个时期,东亚各国在发展中都不同程度地以西方为模板,向西方学习,在全面现代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自身古老的传统及文明进行着全方位的批判、改造甚或颠覆。而在此之间,东亚各国及地区间文化的交流也日益被割裂开来,以致渐行渐远,彼此之间渐渐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同根同源却又不甚相通,这无疑是当今东亚文化现实存在一个问题,这也应当是当代东亚文化难以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当代东亚问题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作为有着共通文化的东亚,作为曾经联系紧密的区域文明,加之近现代相同的历史遭遇,各国各地区在充分珍视自身文明渊源基础上加强沟通,扩大交流,相互学习,最终建立一个相得益彰的文化共同体则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因此,这种多元与统一并存的历史文化传统,业已成为21世纪的东亚出版人希望以图书为媒介,进行知识与信息交流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时代背景。在此背景下,《东亚人文100丛书》应运而生。这是一项宏大的国际出版工程,组成丛书的百部著作,是中、日、韩出版人会同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从近六十年来东亚各国及地区有重大影响、有真知灼见的人文社科著作中精选出来的。这些作品都有对

各自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艺术、思想等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及开创性的探索研究，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东亚人文 100 丛书》的选编不仅仅是中、日、韩及中国台湾和香港三国五地出版人及学者的一次简单合作，它更可看做是为东亚地区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发展所打造的一个平台。在现今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浪潮的席卷下，维护好东亚文化生态自身的整体性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以经典书籍为基础，以共有的东方文化的内在精神为指引，努力重构一个“东亚读书共同体”无疑是丛书出版者共同的心愿，我们寄希望于以此来提升东亚各国、各地区人民对“东亚”这一“文化整体”的认同，消除彼此间的偏见与隔阂，重塑东亚文化在地区内自立、自主、自信的主体地位，实现东亚文化的进一步的交流与繁荣。

《东亚人文 100 丛书》的诞生要特别感谢东亚出版人会议，这是一个以促进东亚地区的出版与文化交流为目的的非盈利性质的民间组织，由来自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的人文书籍出版人组成。东亚出版人会议于 2004 年 7 月发起，2005 年秋在东京举办了首次会议。在此后的七年间，会议以半年为期，轮流在各个国家或地区举行，为东亚人文社科书籍的出版与文化交流，为推动“东亚读书共同体”的实现做着坚实的努力。

有人说，通向未来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回顾过去。从这 100 部最值得东亚人民分享的人文社科著作中，我们可以了解东亚思想文化的渊源与流变，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洞悉各国彼此邻近却又相互隔膜的现代化心路历程。作为出版人，我们不甘心自己的书籍仅仅作为其他

产业的一种附属，如一般消费品般地存在；在这以市场化及经济效益为主导的时代，我们有义务为人文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坚守一片蓝天，为社会及历史的变革保留一份认真的思考、一种诚实的声音。唯其如此，我们才为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担负起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

（原刊于《读书》2005年第1期，略有删节）

“我所看到的，是日本民族在精神上的一次大倒退，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毁灭。”这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的“终战诏书”中的一段话。日本天皇的这段话，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一次大倒退，也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毁灭。

日本民族精神的毁灭，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一次大倒退，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毁灭。日本民族精神的毁灭，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一次大倒退，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毁灭。

日本民族精神的毁灭，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一次大倒退，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毁灭。日本民族精神的毁灭，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一次大倒退，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毁灭。

日本民族精神的毁灭，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一次大倒退，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毁灭。日本民族精神的毁灭，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一次大倒退，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毁灭。

日本民族精神的毁灭，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一次大倒退，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毁灭。日本民族精神的毁灭，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一次大倒退，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又一次毁灭。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导 读

作者 15 岁即前往美国,在哈佛大学专攻哲学,所学以实用主义哲学为主。随着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作者于 1942 年乘坐日美两国交换滞留人员的船只返回日本,后以日本海军文职人员的身份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工作,因病被遣返日本,亲历战败。如上经历不仅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更在作者的精神世界留下了独特印记,由此产生了一位独特的、成为战后日本之代表的杰出思想家。

本书之原型为作者 1979 年 9 月至 1980 年 3 月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授课所用的讲义,译成日文后,由岩波书店以《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年》之名于 1982 年 5 月出版,并获朝日新闻社同年度的大佛次郎奖。

作者选取了中日战争开始的 1931 年至日本战败的 1945 年这段时

间来考察日本的精神史，其用意何在？日本思想形成的历史总是离不开对海外书籍的引进。尤其是明治以后对欧美书籍的翻译，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之后日本人思考问题的方式，还与保留下来的传统生活方式一起，规定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模式。但作者认为，其中唯一例外的就是战争时期。“那是个一说起思想，就说成是‘欧美种’的时代，几乎所有国产以外的思想都被人们远离，日本人就生活在这种近乎锁国的状态下，我就想从这种日子开始写起。”

这样的一个例子在本书开头的“关于‘转向’”一节里就可看到：在这样的“锁国”状态下，曾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影响的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思想的科学”研究会在《共同研究·转向》（平凡社，1959－1962年）中的研究成果也在本书中得到了集约的记载。而且，本书不以特定的思想家或著作作为分析对象，而是试图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读取思想的形态，作者的这一构思在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可以说是鹤见俊辅这一独特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精华之作。

作者在麦吉尔大学所写讲义的后半部后来也已成书——《战后日本的大众文化史——1945－1980年》，由岩波书店于1984年出版发行。

守田省吾 撰 庄娜 译

虽然我出生在日本，但对台湾的了解却远不及对日本本土的了解。我所知道的台湾，都是通过书本、电影、电视剧等途径得来的。当然，我也曾到过台湾，但那只是走马观花，没有深入了解。因此，我写下了这篇文章，希望对台湾读者有所帮助。

致台湾读者序^①

为我所著的《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一书，台湾读者可能已经有所耳闻。这本书主要探讨了日本在战争时期的国民精神状态，以及这种状态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书中提到了许多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同时也涉及到了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希望通过本书，能够帮助台湾读者更好地理解日本的历史和文化。

本书呈现在台湾读者之前，首先，我要以日本本地住民的身份，向 1895 年起被日本殖民 50 年的台湾表示歉意！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这本书为了呈现当时至今住民的记忆，以及作者的愧疚，虽然论述得并不充分，但我仍努力把台湾、朝鲜、千岛群岛、库页岛和南洋群岛这些地方纳入本书的范畴。

在移住台湾斯土成长的日本人之中，尤其在战争时期的日本有独特功绩的人并不多见。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些人——特别是尾崎秀实和埴谷雄高。孩童时期，他们始终无法理解包括自己父母在内的日本人为什么不能善待殖民地时期的台湾人民？即使他们返回日本，这个记忆仍未消失。在日本的知识人之中，他们二人终其一生的活动，在精神深处显然都烙印着殖民地〔台湾〕^② 的记忆。

^①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是据 2008 年台湾行人出版社的中文繁体字版引进。在引进过程中，出版社曾联系鹤见俊辅先生，希望其为中文简体字版再写一序，但鹤见俊辅先生年事已高，云无力为之。因此这里仍保留这个序言，以存原貌。

^② 本书中以〔 〕表示者，为译者的补充说明。

日本政府以战争为目的的“解放大东亚”，把台湾、朝鲜、千岛群岛、库页岛和南洋群岛的住民全纳入日本的支配之下，但现今的日本政府却昧于事实，日本国民也故意视而不见。

大东亚战争战败后的情况又是如何？整个日本仍在持续自我蒙蔽。换句话说，日本人在没有对此作出清醒的反省之前，恐怕很难跟世界居民作密切的交往吧。正因为我见证过战争时期至战后的种种经历，所以我如此坚信。

正如拙著续篇《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史》揭示的那样，与战前的日本文化比较起来，战败后的日本文化特色在于对金钱和欲望的解放。在这股潮流中，邱永汉的赚钱术以及谢国权的男女性关系论的著作都带给日本国民巨大的影响。尽管日本的作者也在同领域发表诸多著作，然而邱、谢二人的著作，显然要比日本本土作者的论述出色得多。其论点获得读者青睐的原因在于，他们并没有把赚钱或男女的性关系建筑在人压榨人的基础上。现在，纵使他们在日本文化论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其著作中仍存在着长年来饱受日本人打压的苦闷余绪。

虽说日本和台湾同属于汉字的国度，但对汉字意涵的掌握却不相同。在此谨向克服个中艰难、翻译拙著的译者致上谢意。

写于 2004 年 6 月 22 日
鹤见俊辅

导 读

李尚霖（台湾开南大学应用日文系）

战争、现代日本以及鹤见俊辅

1945 年，日本对美投降，二次大战宣告结束。然而，战争虽然结束，如何回顾 1945 年以前的历史，在日本国内始终是个问题。而这问题延伸到东亚的地缘政治上，更变成一颗随时会被引爆的炸弹。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 2001 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首次参拜靖国神社后，引发国际社会的一片哗然；小泉此举，同时亦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所谓的“靖国问题”，激荡出一连串的讨论。

然而，在有关“靖国问题”的激烈论辩中，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跳出正反意见的对立，指出“靖国问题”的最大问题，在于一

般日本民众不晓得“问题”在哪！他指出，由于能正确理解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何会成为问题的日本人不多，因此，能明白问题所在并拥有自我思考能力的人，可说是少之又少（参见高桥哲哉：《靖国问题》，筑摩书房，2005年4月）。

高桥哲哉所点出的这个问题，由漫画家小林善纪的作品《战争论》及《台湾论》这些肯定日本“大东亚战争”的著作在日本畅销一时，可大概管窥一二。日本对1945年以后出生的世代，一般称为战后世代。或许是有感于战后世代对战争的陌生与无知，2003年日本文化界邀请了分别任教于东京大学、庆应大学的上野千鹤子与小熊英二，由这两位隶属战后世代的学者，以3天的时间，密集访问一位战前出生的学人，请教他对战争的看法，以及对日本近、现代史的体悟，而后集结成书。而这位代表日本战前世代接受访问的学人，正是本书的作者鹤见俊辅（参见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合著：《戦争が残したもの》，新曜社，2004年3月）。

鹤见俊辅出生于1922年，15岁时前往美国留学，就读哈佛大学哲学系。鹤见俊辅家世显赫，父亲鹤见祐辅、外祖父后藤新平，均是日本政界的大人物。然而，这样的家世背景似乎既是他的资产，同时也是他的压力。鹤见俊辅自陈年少时乃“不良少年”，父母亲由于见他无法适应日本的教育环境，始将他送往美国留学。留学期间，美日开战，他因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被美国政府逮捕，并于拘留所内完成毕业论文。

鹤见俊辅可说是日本现今少数可以称得上“思想家”三字的学者之一；他与丸山真男、竹内好、吉本隆明等日本重要的知识分子，

都有互动往来。鹤见俊辅除了著作等身之外，《思想之科学》这本影响战后日本深远的杂志，亦是由他主导创刊。对战争的反思，一直是鹤见俊辅的一项重要职业志向。值得一提的是，鹤见俊辅除了勤于笔耕之外，同时也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20世纪60年代他参与日本国内反越战运动；20世纪90年代，他参加从军慰安妇之求偿运动；而2004年6月，他更参与“九条会”的发起工作。日本宪法第九条明文宣示放弃战争、不行使武力等主张，近年日本右翼团体酝酿修改宪法第九条。而所谓的“九条会”，其成立宗旨便在于反对日本右翼团体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企图，以维护现今日本宪法和平主义的精神。因此，我们可以知道，鹤见俊辅并非学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除了学者的身份外，同时也是个身体力行的社会运动家。

“转向”与“非转向”

本书，即是鹤见俊辅早年的代表作。如何理解1945年以前的战争？一般日本史学界将1931年以后日本的军事行动区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1931年的满洲事变^①，1937年开始的中日战争，以及1941年以后的太平洋战争。但鹤见俊辅首开风气，将1931年至1945年的一连串战事，视做一个整体，称之为“十五年战争”。此十五年战争之史观，由于能相当程度地掌握满洲事变后日本军事扩张行动的内在关系，而有助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理解与批判，因此被广泛采

^① 即“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之为满洲事变。——编辑

用。本书所讨论的时代背景，即是这十五年战争时期。

如何捕捉与解析这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人的精神轨迹呢？作者的研究方法是将分析重心放在所谓的“转向”现象上。“转向”这字眼在日文中具有特殊的政治涵义。书中提到“转向”二字在日语中之所以普及化，乃是因为1933年日本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佐野学与锅山贞亲发表“转向”的共同声明，宣布放弃以往反天皇制及反殖民主义等主张，转而支持日本国策。而对战前日本知识分子之“转向”，历来因研究者的不同而各有不同之定义。在这里，鹤见俊辅定义“转向”为：“由于国家强制力行使的结果，造成个人或个人所属集团发生思想上的变化。”

而为何国家权力会要挟知识分子，迫使知识分子“转向”呢？作者认为此一现象的产生，可归咎于日本之文化性格以及天皇制国民国家的设计上。作者指出日本江户时代实施的锁国政策，对尔后的日本文化性格，有着重大的影响。文化上的锁国性，乃是因为二百多年的锁国政策，造成日本人一方面安于自己国境之内的生活，产生了内部具有“自我完结性”的情感回路；而另一方面，与情感无直接关系的思考逻辑面，则深受外来优势的文化与语言影响。

而这样的锁国性格，也影响到明治时代打造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的设计师们。作者指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新政体，可分为显教部分与密教部分。显教部分尊崇日本自古以来的天皇制，以天皇为国家象征；密教部分则取经于西方文明，以近代国民国家体制为宗。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方便一边在情感上统合日本传统社会，一边学习西方，以求迎头赶上。

而如此的政治企图之所以能够成功，“国体”这一概念发挥了极大的功用。书中提到，“国体”二字最早出现于幕末吉田松阴与山县大华的争论中。吉田松阴以“国体”二字来指称日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精髓；山县大华则否认这种观点，认为如果真有“国体”这种东西，亦应是普世皆具，各国都有各自的“国体”，不应是日本特有的东西。

“国体”这一概念虽在诞生之初，并未受到全面的肯定，但在明治维新之后，却成了维系新政体于不坠的重要概念。作者指出，“国体”这概念，在明治维新以后演变成用来指称当时日本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也因此，尽管明治以后日本采行西方的国家体制，但“国体”这个概念，却让一般民众产生明治以后的政治体制还是古代天皇制家天下的错觉。

如此的显密双重结构，虽然成功地让日本一举跃入世界强国之林；但不幸的是，代表西方理性的密教部分，却在日本国内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扩张的状态下，逐渐被显教部分天皇至上的主张吞没。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向”的现象于焉产生。日本知识分子在国家权力的压迫下，有的投降、有的坚持、有的部分妥协。作者便是透过比较这些“转向”的不同案例，来追溯与反思日本十五年战争期间的精神史。

然而，在作者提供史料，告诉我们大批日本知识分子在国家的压迫下被迫“转向”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呈现一些不肯与政府多做妥协、顽强的“非转向”典型。而这些“非转向”的典型，却多为知识分子，多半是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下层阶级；有的是忠于自己宗